

「职普融通」搭建学生成才「立交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刘永霞 潘嘉琛

“新成长教育”激发学校创新实践

——访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局局长施文龙

本报记者 张婷 通讯员 刘宇阳

融媒体教育局长访谈

位于上海市南部的奉贤区,临江滨海、地域面积大,与中心城区相距较远,流动人口数量较多,教育区位优势不足。面对此种情况,奉贤区通过区域教育综合改革,不断优化教育资源布局,促进办学质量快速提升,致力于建设“自然、活力、和润”的南上海品质教育区,以“新成长教育”模式绘就奉贤教育改革发展新蓝图。

“新成长教育”如何在奉贤区落地生根?关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奉贤区又有怎样的思考?日前,上海市奉贤区教育局局长施文龙做客中国教育报“融媒体教育局长访谈”直播间,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五星级班主任”带领学生开展“新成长教育”活动。奉贤区教育局供图



育治理体系。

寻找育人方式创新的“奉贤思路”

主持人:近年来,奉贤在“自然、活力、和润”的区域教育发展理念下,一直在推进“新成长教育”,这是出于怎样的思考?

施文龙:早在2015年的《奉贤区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项目方案(2015—2020)》中,就提到了“整体育人”,即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根本的价值取向,实现全员、全程、全面的“五育并举”育人理念。

对此,我们也思考了育人方式创新的“奉贤思路”,通过研究国内外成长教育理论与案例,形成了新成长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思路的初步成果。我们认为,新时代下成长教育应该赋予新的内涵或者新的路径创新,就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21年5月,奉贤区发布了《新成长教育行动纲要》,也就是奉贤区教育事业的“十四五”规划。目前,“新成长教育”已成为具有鲜明标识度的奉贤教育特色品牌。

2022年,我们继续推进部分重点项目,例如推进新成长班集体建设、奉贤区义务教育新成长指数评价等,通过评价的指挥棒来指导和引领各所学校、每位教师转变教育观念,来践行新成长教育的理念。

主持人:如何让教师、学校接受“新成长教育”所推行的新理念?

施文龙:第一,在理念上,我们引领带动教师及学校树立新成长教育价值观——立德树人、全面发展、多元成长,引导教师和学校积极发现学生潜力,注重学生“自我发展性”、保护学生“多元差异性”,通过理念引领教育方法变革。第二,在教学管理上,以课堂和班级为抓手,通过学校管理的效能提升来强化重点项目的撬动,从而推进我们新成长课堂教学、新成长班级建设、新成长学校管理。第

三是重视基本范式的研究。我们在课堂教学、班级建设和学校管理方面,提供了学校的范式的研究,各学校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创新。第四是鼓励学校创新实践。虽然我们提供了范式研究,但并不意味着包办代替,我们鼓励各所学校每一个老师、每一个校长都有自己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间,鼓励他们百花齐放进行创新实践。

目前,奉贤中学完成了市重点的“扁平化管理助推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项目;奉贤教育学院附小推出了“点燃课堂,在多彩学习中激发兴趣与思维”活动,激发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潜力。这些都是基层学校结合我区整体理念、范式架构下自主创新的良好案例。

推进“四化一高”的“奉贤实践”

主持人:如何做好对学生、教师和学校的评价,是当下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点,对此奉贤区有怎样的探索?

施文龙:早在2017年,我们就开始了三种满意度的调研——“学生七彩成长”满意度调研、“教师乐业育人”满意度调研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满意度调研。

2020年,我区全面推进新成长教育,又于2021年9月份发布了《奉贤区义务教育新成长指数评价方案》,旨在充分运用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以及上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评价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诊断区域学校的发展问题,跟进教育改革成效,形成奉贤对学校的评价方案,其核心是新成长指数。新成长指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关键性的教育结果指数,主要关注学生的品德人格养成、学生的知识技能学习、学生的身心体格成长;二是关键性的教育过程指数,指教师乐业育人、学校管理育人、家校合力育人。

同时,我们响应新课标,设置了高阶思维能力、跨学科问题解决能力等考察项目,还包括了体质健康、艺术素养、劳动素养等方面的

评价。“新成长教育”下的评价体系,是探索对学校教育结果全面科学的评价、对教育过程全面科学的评价,最终推动各所学校践行新成长教育理念,推动新成长教育理念落地,成为真正教育方式、育人方式转变的评价机制。因此,新成长指数评价是我们重要的评价的指挥棒。

主持人: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下一步奉贤区教育发展有何规划?

施文龙: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认为,每一个使命在肩的教育人都应该去思考:怎样以中国式现代化教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时代新活力、贡献教育的新力量。

奉贤教育系统内部也对此开展了讨论,并一致决定,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下,推进“四化一高”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奉贤实践。

一是教育发展优先化,加大教育投入;二是育人方式先进化,全面推进新成长教育;三是教育服务均等化,办公平而又高质量的教育,其中包括集团化办学、组团式发展,同时促进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干部和教师的流动,推动乡镇教师支持计划,让乡镇教师安心在乡镇学校工作;四是教育治理现代化,坚持党对教育的全面领导,促进区域教育行政与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提高教育治理效率。

“四化一高”的最终目标就是能够获得百姓较高的满意度,对此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教育改革的进程就是不断地解决一些问题,新的问题总会出现,但是教育人永远在路上。奉贤教育也如此,在目标的引领下,一定能够实现“四化一高”的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奉贤实践样式。



扫描二维码 观看访谈视频

1

以“贤文化”引领品质教育区建设

主持人:上海奉贤区因距离中心城区较远,师资和生源上不占优势。在上海教育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奉贤教育如何定位?

施文龙:“十三五”之前,奉贤教育面临着两个主要的问题:一是在区域和结构上,教育资源布局不平衡的问题;二是如何满足人们对于教育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的问题。

对此,2015年,奉贤区研制了《奉贤区推进教育综合改革试验区项目方案(2015—2020)》,提出了要通过“敬奉贤人、见贤思齐”的“贤文化”,建设“自然、活力、和润”的南上海品质教育区,来推动奉贤教育由资源规模、教育质量的跨越式发展到资源足、质量优的品质化发展转型。

围绕该目标,自2015年至2020年,我们持续不断地进行探索和推进,从四个方面推动,其中包含4大领域、20个行动目标、14个行动计划。

第一个方面是探索整体育人的机制。在关于如何形成具有“贤文化”特色的育人体系问题上,我们实施了三大工程——“人文蕴育”“德育创新工程”“人文课堂”教学改革工程、“七彩成长”学生发展“美育工程”。

第二个方面是大力推进城乡教育的一体化发展,主要着力点是集团化办学,例如在上海实施了初中强校工程。

第三个方面是创新推进教师队伍建设。我们提出了“3233”教师队伍体系建设,即推动市、区、校三级联动的教师队伍建设,干部与教师双轮驱动,基础、骨干、名优三类型教师梯次推进,聘用流动、培训晋升、激励三方保障形成合力。同时,我们还设置了卓越教师培养工程、乡镇教师支持计划、推进全员岗位聘任,这些都是“3233”当中的重点项目。

第四个方面则是优化资源布局、完善教

2

加强基层监管力量 深化校外培训治理

董圣足

区域观察

自2021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齐抓共管和社会各方面协同配合下,校外培训治理取得很大成绩,培训行业乱象得到极大遏制,中小学生学习校外培训负担大大减轻,广大学生家长的经济及精力负担显著降低。根据国家层面的总体部署,现阶段校外培训治理的重点任务是,深化学科类培训治理,强化非学科类培训监管工作。

常态监督保证“双减”落地

两年多来,按照“双减”文件要求,各地相继推出各种配套措施,全面加强校外培训机构常态监管,不断推进校外培训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有力保障了“双减”工作的落地见效。

一是全面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各地逐步建立了“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浙江省建立了省、市、县(区)三级联动,教育、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的培训机构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重庆市成立校外培训机构清理规范和维护稳定工作专班,市本级及41个区县都成立了校外培训监管职能机构。云南省增加科技、文旅、体育等部门为“双减”工作专班成员单位,切实强化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的归口管理。

二是不断完善行政监管制度。各地相继构建了覆盖校外培训机构设置及运营各环节的全流程监管制度。针对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浙江、重庆、湖南、云南等四省教育部分会同文旅、科技、体育等部门,在全国较早出台了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设立审批标准及监督管理

办法。针对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的治理,湖南省教育厅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科类隐形变异培训防范治理工作的实施方案》,深入明确了预防、发现、查处机制建设的重点任务及部门分工。

三是稳步构建综合执法体系。各地积极探索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制度建设,逐步理顺有关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机制。浙江省推动各区县全面融入“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和数字化改革,增强了校外培训的执法力量。重庆市着力构建校外培训市场综合执法机制,形成了多部门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联合监管格局。

四是大力创新日常监管方式。湖南长沙从行政审批、日常监管、投诉举报处理、安全监管、无证办学处置等五方面明确非学科类培训监管职责。云南昆明通过现场通报批评、书面通报批评、下达整改通知、实施严厉惩戒“四步法”,强力推进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全流程监管。重庆市各区县全面上线“二维码随手拍”便捷投诉举报平台,畅通问题反映渠道。

进一步提升校外培训治理效能

调查表明,虽然两年多来各地在校外培训治理上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囿于各种主客观因素,地方层面在校外培训监管上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一是校内有效供给不够。过去一个阶段,各地对校外培训“供给侧”进行了极大压减。但广大中小学生和家长们仍希望通过“培优补差”以提高应试分数。受此影响,在逐利资本加持下,各类隐形变异校外学科培训沉渣泛起、屡禁不止。

二是相关部门协同不力。不少地方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仍以教育行政部门为主在

“唱戏”,其他部门协同配合不够得力。个别省域行业主管部门至今没有出台本行业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设置标准及监管办法,有的地方尚未完全将校外学科类培训治理纳入乡镇网格化管理格局,一些基层还存在依靠相关部门“帮助”临时执法而不是联合常态执法的情况。

三是基层监管力量不强。虽然大部分省级教育部门效仿国家层面的做法,都设立了校外培训机构监管职能处室,但总体上力量配备不足,特别是地市以下教育行政部门的相应科室多以临时借调的兼职人员为主。同时,区县一级编制十分短缺,没有专门的执法队伍,加上治理工具欠缺,也导致了一些违法违规培训行为得不到及时查处。

四是上位法制资源不足。《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的颁布,弥补了校外培训监管专门性法制资源的缺失。但从宏观上看,当前校外培训治理文件制定的主要依据是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而这些法律大部分条款是专门针对全日制学校的,并不完全适用于培训机构,也未能涵盖校外培训监管的最新内容。因缺少充分的上位法源支撑,现实中一些监管规定的刚性和约束力都显不足,影响了其实际执行力。

多管齐下补齐监管“短板”

未来一个时期,要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真正落实“双减”任务,需要在优化教育资源均衡配置、力促家庭教育回归理性、推动社会教育共建共享的基础上,多管齐下、多措并举,稳步实现校外培训治理常态化、长效化。

提升教育质量,抓好源头治理。落实“双减”文件精神,各地要深化教育评价方式改革,大力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深入做好校内课后服务工作,更好满足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在此

基础上,要切实加大义务教育办学经费投入力度及统筹层级,进一步均衡教育资源配置,扩大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同时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加快缩小教育差距,从根本上消除家长焦虑,降低学生“补课”刚需。

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综合治理。一方面,要进一步健全学科类校外隐形变异培训的预防、发现及查处机制,严禁任何机构或个人面向在校中小学生开展各种形式的违规学科类培训活动,并切实规范各类校外托管服务。另一方面,要尽快完善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监管制度,建立“省级统筹、属地负责、行业审批、联合监管”的工作机制,制定非学科类培训机构设置标准。

强化综合执法,巩固协同治理。加快教育系统综合执法机构设置,加强教育自身执法力量配备,切实提高校外培训监管行政执法能力。发挥教育部门的统筹作用,完善并巩固由市监、住建(消防)、房管、公安、网信、通信、银监、税务等多部门协同和街镇、村居等全方位联动的网格化管理体系。用好用足用活行业组织在校外培训机构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提升全行业协同执法能力。

加快立法进程,夯实依法治理。从实际情况看,深入推进校外培训治理法治化刻不容缓。在直接立法尚不成熟时,可基于现实需要,先行制定出台监管条例,形成更具权威性和强制力的制度规范。同时,要赋予监管部门对违法办学“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权,通过法定形式固化多部门联动的综合执法机制,厘清并压实相关部门的工作责任,以国家统一意志确保中央“双减”政策的长期性、稳定性和可执行性。

(作者系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所长、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专家委员会成员)

“哒哒哒,哒哒哒……”近日,在山东省菏泽市郯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服装设计实操教室里,学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裁剪、锁边、缝制衣服;“这个圆还要再大一些”“画面的整体颜色要再提亮一些”,在该校计算机应用实操教室里,老师正带领学生学习做商品促销图标,课堂气氛很是活跃;在另一间文秘专业教室里,学生李玉娇正在聚精会神地听着老师讲解,认真做着笔记。

暑假前,李玉娇还是郯城二中的一名普通高中生。高一结束后,文化课成绩并没有达到她的预期,为了将来有更好的发展、更适合自己的成长路径,李玉娇和家人决定,通过“职普融通”途径,转入了郯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文秘班,成为一名“职高生”。

郯城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刘希强介绍,近年来,郯城县教体局认真研究落实《山东省关于提质培优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的意见》和《菏泽市建设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实施方案》,并紧密结合县域内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生源和教学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郯城县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开展高中阶段学校职普融通工作的实施方案》,踏踏实实探索县域内“职普融通”的具体路径。

“职普融通”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育规律、发展趋势等相互融合,为学生提供更加综合的教育和实训,使其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就业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刘希强说。

郯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和郯城二中,之前是“两个校名一所学校”,在此基础上,按照上级部门有关要求,2020年9月,被郯城县教体局定为“职普融通”试点校。

之所以选择这所综合高中为试点单位,郯城县教体局局办科长陈成军认为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师资,二是实训条件。

首先,郯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有一支专业素养较高的师资队伍,拥有实训基地,开设有机电、计算机、护理等13个专业,能满足普转职学生在专业选择方面的需求。

其次,综合高中更便于推动普高与职高之间“优势互补”。在郯城二中的带动下,郯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近几年的春季高考中,本科上线人数呈上升趋势,每年都有200多名学生被本科院校录取。

此外,该校每年普高和职高两个校区之间都有交流活动。“普高学生可以及时了解职高学校的专业与发展,为开展普转职工作做好了思想方面的铺垫。”陈成军说。

自“职普融通”开展试点工作以来,郯城持续开展校际教研及交流活动,打造高质量“联合教研共同体”,实现教育资源共享、贯通、互认,达到协同发展、育人人才的目的,进一步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横向融通。

郯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副校长孙福亚告诉记者,最初,“职普融通”试点工作开展遭到了一些质疑,工作开展并不顺利,这主要还是缘于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不足,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现在不少大学既有面向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也有面向职业高中的招生计划。职高的考生进校后跟普高的考生待遇是一样的。”孙福亚说。

面对学生和家长的疑惑点,郯城县教体局局办科长陈成军,从实施方案、师资配备、课程设置等方面,对学生与家长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沟通。

试点当年,郯城二中高二年级116名学生转入郯城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在2022年春季高考中,其中有81人升入本科院校,35人升入高职院校,喜人的是学生和家长通过“职高高考”更深入地了解了职业教育,理解了“职普融通”工作。

“近三年来,200多名学生通过‘职普融通’升入了本科院校。”孙福亚说。“职普融通”让郯城不少学生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也让更多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平台,走上了技能成才的道路。